

冷战后的中国特使外交

李志斐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中国特使外交作为非传统外交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交事务中,其无论是在形式、内容还是在功能上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代表性,而且制度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发展出来的一种新模式。特使外交的频繁使用和制度化发展是中国克服常驻外交有限性与外交事务处理的专门化、多样化要求之间矛盾的灵活化处理,是对拓展国际利益和实现外交转型的平衡性把握,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用国际主流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和融入国际体系的积极选择。

[关键词] 冷战后; 中国特使外交; 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8)03-0024-07

自2002年正式公开派遣特使出使中东地区后,“特使外交”作为一种非传统外交方式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中,越来越多的外交特使们代表着中国政府或元首,在世界各地频繁穿梭,传递中国声音,斡旋国际事宜,呈现出别样的外交风采。中国冷战后开展的特使外交无论是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在功能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独特性和代表性,系统的分析中国冷战后的特使外交,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把握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战略,更全面的认识中国对外交往现状,更客观的分析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更准确的预测中国外交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特使外交”是分析冷战后中国外交的新视角。

一、中国特使外交的主要活动

“特使外交”是指一国政府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名义,派出负有专门使命的官方代表,为执行

某些特定的、临时的外交使命或任务而进行的高层次之间的外交活动的统称。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便出现了外交特使这一职务,特使外交偶尔登台亮相,职责相对比较简单。但随着中国在某些地区或国际事务上介入的增多和深入,外交特使的派遣次数不断增多,所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特使外交开展的活动内容也越来越多元和复杂。

作为一种非传统性的外交方式,特使外交活动主要包含两种性质的特使外交,一种是政治性特使外交,例如,就某一国际或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斡旋,参加某个多边或双边谈判,推动一项国际性政策主张、参见某个国际会议或活动等;另一种是礼仪性特使外交,主要表现为出席某国新政府的就职典礼或权力交接仪式、出席国王加冕仪式或高级官员的婚礼、葬礼等。就中国冷战后开展的特使外交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参加他国重大的纪念活动

(1) 列席国家元首的加冕典礼或就职仪式。

国家元首的加冕和就职典礼通常是一国的最高政治典礼,派遣特使出席典礼,表达的是中国对他国国家权威的承认和尊严的尊重,传递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态度。从1993年到2008年初,中国已经陆续派遣了11次这种性质的外交特使出访,例如,1993年8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参加总统交接仪式;2004年12月,中国政府特使李辉参加阿富汗总统的就职典礼;2005年8月,中国政府特使李金章前往布隆迪参加总统就职典礼;2006年1月,中国政府特使吴爱英参加玻利维亚总统的就职典礼;2006年3月,中国政府特使杜青林见证智利总统的权力交接;2006年7月,中国政府特使王旭东参加哥伦比亚总统的就职典礼;2006年8月,中国政府特使翟隼参加乍得总统代比的就职典礼;2006年11月,中国政府特使李盛霖参加墨西哥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006年12月,中国政府特使崔永乾参加刚果总统卡拉比的就职仪式;2007年4月,胡锦涛主席特使韩启德参加塞内加尔总统瓦德的就职仪式;2007年12月,中国政府派遣科技部部长万钢前往阿根廷参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2)参加对东道国有重要意义的仪式活动。2007年3月,中国政府特使李盛霖参加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开港仪式。(3)参加国家的独立庆典等活动。2007年3月,胡锦涛主席特使阿不来提·阿不热都热而提参加加纳独立50周年庆典活动;2006年10月,胡锦涛主席特使徐匡迪前往蒙古参加“大蒙古国”800周年纪念活动。(4)参加某国的重要领导人的葬礼活动。2000年10月,中国政府特使何鲁丽前往斯里兰卡参加班达拉奈夫人的葬礼;2004年11月,中国政府特使回良玉前往巴勒斯坦参加阿拉法特的葬礼。2006年6月,胡锦涛主席特使李肇星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2007年5月,中国政府特使王永秋参加萨摩亚总统马列托亚的国葬。

2 协调国际事务,调解国际纷争,维护世界和平

冷战后,中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地区一直伴随着战乱与纷争的威胁,危机与冲突不断,中国作为联合

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肩负着解决地区冲突,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使命,此外,广大阿拉伯国家也一直希望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对他们的呼吁的重视和回应,中国结合这两个地区特殊的国际环境,在这两个地区开展了大量的特使外交活动。(1)介入中东地区事务。中国政府先后任命资深外交官王世杰与孙必干为中国的中东问题特使,代表中国与中东问题有关各方及国际社会联系,积极劝和促谈,为使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积极进展而不懈努力,积极参与中东的和平进程,推动中东各方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中东目前的问题。从2003年5月到现在,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共出使中东地区12次,遍访中东地区各国,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及中东地区各方阐述中国立场,协调各国纷争,推动政治互信的重建,倡导阿拉伯世界的团结,推动中东和平进程。(2)介入朝鲜半岛事务。朝鲜核危机的政治解决涉及到中国的周边安全,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积极斡旋朝鲜核危机和事务,推动朝鲜的和平谈判,从2004年3月至2005年10月,中国政府特使宁赋魁先后三次出访美国和朝鲜为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斡旋;2005年2月,中国政府特使王家瑞出使朝鲜,说服朝鲜重返六方会谈;2006年10月,胡锦涛主席特使唐家璇出访美国与俄罗斯,听取两方对朝鲜问题的立场,协调其对朝政策,推动朝鲜问题政治谈判进程的顺利进行;2007年4月,中国政府正式任命了陈乃清为朝鲜半岛事务特使,专门负责朝核问题,直接辅佐六方会谈中方团长,从而更有效的推动朝鲜六方会谈,实现朝鲜无核化;在2008年初,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再次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先后奔赴韩国,为缓解韩国新总统李明博上任后造成的新一轮韩朝关系急速恶化和朝核问题开展斡旋。

3.介入非洲内部事务,推动内部纷争的妥善解决,促进中非关系良性发展。

鉴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2007年5月,中国政府委派了刘贵今大使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专门参与协调处理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同时,将为加强中国

对非工作、密切中国与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的联系、促进中非关系不断发展而不懈努力,从 2007 年 5 月到 2008 年 2 月份,刘贵今特使已先后 4 次出使苏丹,为推动苏丹的混合维和行动方案的实施和达尔富尔的政治化进程,实现苏丹的整体和平而不懈努力。

4. 代表中国政府参加重要的国际性会议

伊拉克战争结束伊始,伊拉克战后的政治走向问题提上了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议程,在 2004 年 11 月召开的伊拉克国际会议上,中国政府特使王光亚出席了会议,阐述了中方对伊拉克局势以及伊拉克问题的看法。表示愿意与国际社会共同帮助伊拉克尽快恢复稳定,展开重建工作;2002 年 1 月,中国政府特使出使东京,在东京国际援助会议上向阿富汗援助 100 万美元;从 2004 年开始,中国先后派出乔宗淮、吕国增等特使参加非盟首脑会议,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

5. 亲善修好访问、传达中国信息

2004 年 3 月,在小泉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政府派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为特使访问日本,在赞赏了小泉的“中国发展机遇论”后,委婉地提出希望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的要求。同年,戴秉国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两次访美,转交了胡锦涛主席致布什总统的信,并与美方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朝鲜、伊朗核问题等当前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看法,向美国有效的传达了中国的立场及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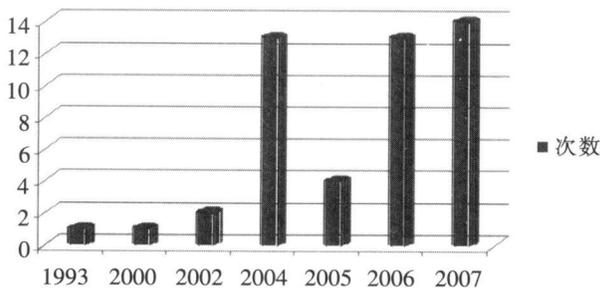
二、中国特使外交的主要特征

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的外交事业开始面临新的国际环境,外交思维与策略也开始与时俱进的改变,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在冷战后的十多年中,中国的特使外交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第一,在数量上,中国开展特使外交的次数总体上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尤其是 2006 年和 2007 年,以至于有些外国媒体称 2007 年是“特使外交年”。

(见图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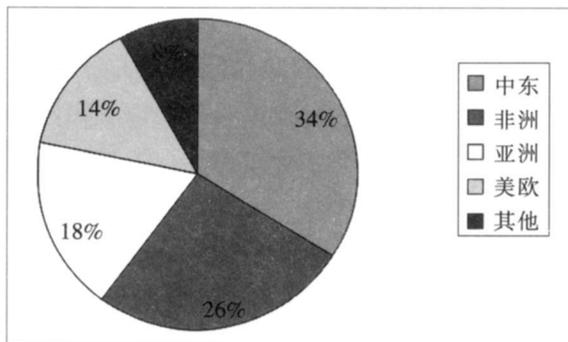
冷战后中国特使外交数量图



图表 1

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 <http://www.mfa.gov.cn>

第二,在地域上,呈现出“覆盖全球,地区侧重不同”的特征。在开展特使外交的地域上,中国放眼全球,覆盖七大洲,但同时又有着鲜明的地区倾向,以亚非和中东地区为主,其中,自冷战结束后,中国派遣外交特使出访最多的地区为中东,约 17 次;其次是非洲,数量为 13 次;然后是亚洲,数量为 9 次;包括美欧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大约 11 次。(见图表 2)



图表 2

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 <http://www.mfa.gov.cn>

第三,在形式上,礼仪性特使外交与政治性特使外交贯穿使用,政府特使外交与首脑特使外交交相辉映。

中国在冷战后根据国际形势与自身的战略定位,灵活的选用不同种类和性质的特使外交形式,对于非洲地区,中国大多数采用的是礼仪性的特使外交方式,但随着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凸现,政治性的特使外交日益成为重点;对于存在不稳定因素的中东地区和西亚地区,中国则大多数使用政治性特使外交。而在外交特使的派出主体方面,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中国的外交特使派出基本上分为政府层面和国家主席层面,总体分析来看,政府层

面的特使外交居多,以政治性为主,但是自 2006 年以来,以国家主席胡锦涛名义派出的特使开始走访于世界各地,但是多数属于礼仪性质的特使外交活动。

第四,在理念上,“和谐世界”是中国特使外交的核心理念。自 2005 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利用雅加达亚非峰会和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庆典的多边外交场合正式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之后,“和谐世界”就成为指导中国对外政策制定和外交工作开展的核心理念。“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强调通过和平与合作消除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制止任何形式的暴力战争和恐怖主义,加强多边主义,谋求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协作,创造和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最终实现人类共赢。“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外交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中国的所有外交行为中都有“和谐世界”理念的体现。冷战后中国开展的特使外交中始终贯穿着中国力求通过外交运作来谋求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思想和目标,尤其是 2005 年以后,这种创造世界和平与共赢的理念和目标就更为明确。即使是在礼仪性质的特使外交活动中,中国特使传递的不仅是对东道国国家尊严的尊重和人民的友好,更是传递着中国与世界共创和谐的理念。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介入朝核问题、中东问题、达尔富尔问题,“和谐世界”的理念就体现的更为淋漓尽致,在中国的所有斡旋和运作中,一直坚持的主旨就是通过对话、谈判、协商的途径消除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和平、妥当的化解地区危机,在多边合作中实现地区和平。可以说,作为中国外交战略行为的一部分,特使外交的运作正是“和谐世界”外交新理念的积极实践。

第五,在发展上,专职特使制度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冷战结束后,中国特使外交呈现出由不定性向习惯化与制度化的方向转变,自 2002 年以来,中国陆续设置了中东问题特使、朝鲜半岛问题特使和非洲问题特别代表等,像王世杰、孙必干、陈乃清、刘贵今这样专职的、有任期的特使,本质上跟中国驻某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一样,是专注于解决某个特殊的

问题而设的外交代表职务。中国在利益攸关的地区设置专职特使,使特使外交机制化,有助于中国在相关区域和领域的介入及斡旋保持持续性和长期化,有助于中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按照自身的利益需求和战略选择开展外交行为,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热点地区最大化地发挥负责任大国的政治作用,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与和平局面的创造。特使外交的制度化的,是当代中国外交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模式,表明了当代中国外交发展的复杂化和专业化,它标志着中国准备承担国际责任,更多的积极参与解决国际问题,做真正负责任的大国。

三、中国特使外交 制度化发展的原因

专职特使制度化是当代中国外交不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模式,代表了中国特使外交制度化发展的趋势,为何中国在冷战后,尤其是近两年频繁的选择特使外交作为外交事务处理中的重要外交手段?笔者认为,特使外交的频繁使用和制度化发展是中国克服常驻外交有限性与外交事务处理的专门化、多样化要求之间的矛盾灵活化处理,是对拓展国际利益和实现外交转型的平衡性把握,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用国际主流方式出牌的行为选择。

1. 外交事务处理专门化、灵活性的客观要求

作为一种非传统性质的外交方式,特使外交无论是在外交特使人选的选择上,还是具体过程的开展方面,都表现出“特有”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极大的增强了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和行为选择的回旋余地,增强了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对于实践中国“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具有很大的适应性。

首先,在外交特使的选用方面,中国派遣的外交特使通常是熟悉相关地区和事务的外交人员,具有相对丰富的地区外交经验和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目前三个专职化外交特使,他们都是长期从事中东、朝鲜和非洲外交事务的资深外交官,熟悉这些地区的事务背景,具有丰富的外交阅历和经验,精通当地语言和风俗文化,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相关

领域的工作而建立起来的丰富的地区和国际社会人脉关系,更加容易的被相关国家所认可和接受,可以解决普通外交官所不能解决的事务,增强外交工作开展效率。另外,特使人选比较灵活,既可以是高级别(如副总理级)的官员,也可以是较高级别(如部长、副部长)的官员;既可以是现职官员,也可以是离任甚至退休的官员;既可以是专家或专职官员,也可以是非专业人士,即便是针对同一地区和同一事件,也可以针对事件和问题的不同性质和发展阶段来视具体情况进行特殊安排,有针对性的开展外交斡旋,最为明显的就是朝鲜核问题,中国从2002年至今就先后派出了戴秉国、唐家璇、吴仪、宁赋魁、王家瑞等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开展穿梭外交。

再次,由于特使外交派遣方的权威性和特殊性,可以得到对方的重视,受到较高礼遇,外交特使通常可以见到往访国的政府首脑甚至国家元首,而同样级别的官员一般只能见到比自己高一个级别的对方官员,这种一般外交官员所不具有的外交优势,可以更加直接的传递中国的信息,增强斡旋的份量和力度,推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进程,此外,特使外交开展时间的灵活性。外交特使的派遣履行手续程序简单,在国家政府同意的基础上,在持有元首或首脑签署的授权证书或亲笔信后,就可以立即办理,尤其是在发生突发事件或地区形势发展突变时,可以根据事态的发展进程迅速派出,尽快的介入事态的解决和事件的斡旋之中,及时的传递本国信息,保护和争取本国利益。

2. 国家利益谋求与中国外交策略选择之间的折中

实现国家利益是任何外交行为的最原始动力,而利益的追求和实现程度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大小,还取决于外交策略的选择,中国的制度化特使就是国家利益谋求和外交策略选择的折中表现。

首先,安全利益的维护与外交策略选择的折中,以对朝特使外交制度化为例。中国东北部与朝鲜接壤,朝核危机的持续存在会改变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一旦美国发动战争占领朝鲜,武力促使朝鲜半岛统一,不仅会改变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彻底改变

东北亚的安全平衡,更会使中国失去朝鲜这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屏障,直接面对美、日、韩的军事同盟的三面包围,大大降低中国的安全感,所以,作为唇齿相依的中国会最大可能的介入朝鲜问题的和平化解决,而在解决的外交策略选择方面,中国深知核问题解决的高度“上层”政治化,为了更便捷、更灵活的在各国高层之间斡旋,增进外交斡旋的力度和进展的效率,中国选择了高度上层化的特使外交方式作为介入朝核问题的主要方式,并使之专门化、长期化和制度化,充分运用外交运作的灵活性来最大程度实现了对国家安全保障的追求。

再次,战略利益空间拓展和外交策略选择的折中,以对中东特使外交制度化为例。中东地区是世界石油的主要储存地和供应地,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石油由此进口,一直与中东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能源合作和经济往来,另外,中东地区地缘位置独特,战略价值优越能源,价值巨大,历来是各国争夺之地,所以,随着中国国际战略空间的拓展,中国必然关注中东,寻求在中东事务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中东地区基本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尤其是美国“利用海湾战争确立了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后,力图独霸中东事务。其他西方大国纷纷通过经济手段介入中东。同时,中东各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始终占据主要地位。这对中国发展同中东地区的关系构成挑战。”^[1]如果中国要以政治性、外交性手段介入中东事务争取更多中国利益的话,就必须避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非理性对抗和排斥,使中东各国接受中国的介入,而这就需要高度娴熟的外交技巧和策略,而特使外交在外交斡旋上极度灵活、行为方式上有极强的选择性和可伸缩性,而且加上谙熟中东事务的老外交官们的外交运筹帷幄,可以在循序渐进和游刃有余中拓展中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空间,保障国家利益实现。

最后,海外权益的保护与外交策略选择的折中,以中国派遣非洲特别代表为例。非洲面积广阔,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在能源方面,已经成为中国继中东地区之后的第二大进口区域,非洲地区不断复苏的经济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极大的提升了非洲地区的

战略地位,截至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与 40 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经常性贸易和投资往来,中国石油集团等大型石油企业纷纷开始在苏丹等地开展项目合作和投资,所以,中国在非洲地区具有巨大的海外权益。在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初时阶段,中国一直秉承一贯的不干涉苏丹政府内政,认为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是苏丹内政,应由苏丹政府自主解决国内危机,但是美欧出于巨大的政治需要和经济利益纷纷介入达尔富尔问题的处理,积极推动联合国通过制裁苏丹石油工业的 1556 和 1564 决议,在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投票中,中国以一张弃权票被动的表达对于苏丹问题国际化处理的回避,但是这种被动的回避不但没有避免达尔富尔危机的国际化处理道路,反倒会使中国在苏丹的海外石油战略和经济安全受到危害,使中国的海外权益和战略空间扩张受到挤压。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外交工作有责任保护国家的海外权益,达尔富尔危机的爆发和处理使中国政府开始更多的思考如何在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和国际道义原则的同时,利用政治化介入和外交手段来保护中国在非洲的综合权益和进一步拓展中国对非战略利益空间,如何从建国之初以意识形态划分确立的“非洲兄弟”之情的友好政策逐步的转变当前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服从于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为,所以,可以说,达尔富尔危机的发生为中国对非外交工作的策略转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中国政府选择特使外交作为介入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外交方式,既能在苏丹和美欧大国之间开展高层斡旋,又能介入到危机的具体处理过程中,同时还可完成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道义原则,因此,对非特使外交的制度化,是中国保护海外权益和现实利益的高超外交策略。

4 冷战后中国外交力增强的结果

外交实力,简称外交力,是国家综合实力在一国外交领域中的实践和体现,

主要包含外交资源和外交能力两大内容,中国之所以有能力开展特使外交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具备了充足的外交资源和外交能力的结果。

首先,在外交资源方面。“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外交资源不仅包括狭义上的外交官、外交机构,同时也包括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如一国的综合国力、地缘优势、自然资源、战略理念、国际影响力。”^[2]具体到中国而言,第一,在中国的外交领域中,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精通外交知识、具备丰富外交经验和国际人脉资源的外交人员,具有专业化的外交团队和高效运作的外交部门,为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丰厚的人力资源;第二,在政治资源方面,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已经和世界上 95% 以上的主权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所推行的“尊重他国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冲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和实践已经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和积极拥护,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有效政治资源;第三,在物质资源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是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贸易往来和海外投资涉及全球各个地区和领域,巨大的综合实力和经济联系为中国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资源;在地缘优势方面,中国地域广阔,具有众多的接壤国,在东亚问题的处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第四,在文化资源方面,中国依托具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精髓,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丰厚文化资源日益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有效依托资源。所以,中国外交资源的丰富化为中国多样化的开展外交工作提供了足够的力量支持。

其次,在外交能力方面。外交资源能不能最终成为有效的转化为外交成果,主要取决于外交能力的大小。外交能力,顾名思义,就是外交部门有效转化,具体转化和配置外交资源的能力。在外交资源的转化过程中,阶级斗争的外交理念被和谐世界的理念所代替,意识形态决定一切转变为国际利益为根本的外交指导思想,中国在外交目标的确定方面越来越务实化和理性化,外交手段的选择方面越来越多样化,外交过程越来越有规划性,对突发事件的

(下转第 34 页)

阻止中国没可能,为什么不同中国合作,使自己在
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受益呢?遏制中国崛起,扯中国的
后腿,硬要把中国拉下来,使中国变弱,到头来只能
培养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到时候真的会把一个强
大的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美国将面对一个强大且

对其充满仇恨的中国。同时,中国会与其他国家形
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美国无法左右,只能听之任之,
这样的结局更糟糕、更难堪。因此,更现实地看,对
美国来说,更好的选择是努力合作,帮助中国发展。

[参考文献]

- [1] 余逊达.中美关系:来自民众的看法[J].世界经济与
政治, 2001(6).
- [2] 任晓,沈 屹.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3

(责任编辑 齐琳)

(上接第 29页)

反应速度和能力日益增强,针对关键的外交日程,中
国会再很短的时间内聚集有限资源,使外交日程高
效开展,外交政策高效实践。总体来说,中国外交部
门对外交资源的整合和转化的能力使之具备了在国
际舞台上运筹帷幄的自信。

结 论

冷战结束后,中国特使外交的增多,是中国面对
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和环境,对于如何更有效的以
国际主流方式出牌,如何在国家利益拓展和国际道

义原则之间把握平衡,如何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
体系做一个真正负责的国际社会成员等问题的思
考,是“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新理念在外交事务中
的积极实践。通过梳理和分析冷战后特使外交发展
的历程、特征和动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交工作的
务实和灵活,体会到中国在积极的应对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世界推行的新霸权和新强权的同时努力的推
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世界的和谐化的负责任态度
与精神,中国通过特使外交展示给世界的是一个积
极“走出来”的新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 [1] 李伟建.关于中国和 中东国家关系的分析和思考
[J].阿拉伯世界, 1998(4).
- [2] 邓新年.外交资源的开发与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良

性互动[J].文史博览, 2006(10).

(责任编辑 双木)